

# 莫让扭曲政绩观给全国统一大市场“添堵”

□ 赵晓昕

## 海音佚语

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,最难拆的不是行政壁垒,而是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无形的“墙”。

近日,全国人大代表、TCL创始人、董事长李东生在谈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时,指出了消费补贴政策在一些地方实际落地时的跑偏走样问题。

据其所述,这两年,国家出台大宗消费品补贴政策以提振市场,但部分地方出于增加本地经营主体数量的政绩考量,要求企业必须在当地注册独立法人,否则不予发放补贴。仅2025年,TCL就在全国各地新增了约540家法人主体。

身为TCL掌舵人,李东生的观察跳出了单一地区的视野,直指企业自身无力改变的 systemic 问题。透过“540”这个数字,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冲突。

这种冲突,企业有着直观感受。对企业而言,多注册一个法人主体,管理就多一个环节,

思想上的堵点是最大的堵点,政绩观上的错位是最大的错位。

且后期撤销流程繁琐、手续麻烦,耗费人力与精力。李东生直言,这种做法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,且没有创造任何实际的社会价值。

但在一些地方眼里,账不是这么算的。新增的经营主体是经济数据的一部分,是显性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只算本地“小账”,不顾全局“大账”的狭隘思维驱动下,地方人为设置门槛,抬高制度性交易成本,以企业效率的减法换取政绩的加法。

然而,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根本目的,是要让资源、要素流动更畅通,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。行政逻辑不当介入,会导致该放手的放不下,越位干预、设卡设限,把“活水”变成“死水”,让“小循环”阻断了“大循环”。如此一来,政策的善意大打折扣,更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“添堵”。

这些年,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,但在一些领域,阻碍市场竞争、束缚市场活力的弊端依然存在,“篱笆墙”“隐

形门”屡禁不止,一些“好经”频频被“念歪”。究其原因,思想上的堵点是最大的堵点,政绩观上的错位是最大的错位。

校准政绩观,关键在于校准考核“指挥棒”。地方保护主义与行政垄断问题的背后,往往交织着政绩考核的压力、地方财政的焦虑、资源竞争的冲动等多种因素。这首先要求考核指标不能“一刀切”,更不能只看短期经济数据,而忽略了那些打基础、利长远的工作。

如果评价体系侧重于经营主体数量、招商引资规模等显性指标,地方就难免花费大量精力在数字、报表上做文章。只有将营商环境优劣、市场主体获得感、要素流通顺畅度等纳入考核体系,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政绩冲动,避免制造更多卡点堵点。近年来,山东将“市场壁垒清零”纳入地市级考核,湖北把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,都是积极的尝试。

还要看到,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(试行)》已明确提出,各地区不得强制要求经营主体在本地登记注册,或者以在本地设立法人机构等作为享受相关补贴的前提条件。政策红线画得清清楚楚,仍有地方阳奉阴违。这就要求必须强化制度刚性,建立明确的问责机制和常态化监督体系,对长期存在、反复出现的突出问题精准识别、督促整改,并且加强典型案例、问题清单的公开通报,形成正向引导。

事实上,已有不少地方率先拆掉思想上的“围墙”,打破行政区划壁垒,推行飞地经济模式、财税利益和经济指标共享机制等改革。以沪滇“牵手”为例,上海和云南结对共建园区,推行“上海企业+云南资源”“上海研发+云南制造”协作模式,在机制共建、产业共享上同向发力。实践证明,当地方政府跳出“一亩三分地”思维定式,多打大算盘、算大账,让人才、资金、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,不仅不会削弱本地的竞争力,反而能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多赢。

全国统一大市场是14亿人口共享的市场,越是试图搞“政策洼地”、建“小市场”,越会削弱市场信心、贻误发展良机。莫让扭曲政绩观给全国统一大市场“添堵”,类似“540家法人主体”的现象,不应反复上演。

# 考公「心理战」,当心聪明反被聪明误

□ 辛语

近日,广东省公务员考试中,广州中院一法官助理岗位的笔试第一名考生,通过“P图”将成绩提高了14.4分,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虚假成绩单,试图“吓退”其他同岗位竞争者,引发极大争议。第二名考生因分数差距放弃系统备考后,发现自己被误导,愤而向报考单位提交了举报信。目前,广州中院表示已关注此事并正在处理。

事件引发关注后,舆论场主要有两种声音交织。一种认为,该考生虽然“手段卑劣”,但没有违反任何明文规定,因此谈不上过错。另一种则认为,为求“上岸”不择手段,道德上已有明显瑕疵,这样的人不该进入公务员队伍。

两种声音,本质上是两种评价体系的碰撞,也折射出“考公热”下的集体焦虑。近年来,“考公热”持续升温,“上岸”与否成为衡量世俗意义上成功的重要标尺。为“P图”辩护的人,大概率是觉得“灰色手段”本身也是一种能力,其他考生被误导,是判断力不够,心理素质不过关,应该“愿赌服输”。

这种心态有着相应的社会心理根源。当社会评价体系趋向单一化,结果就愈发压倒一切,手段的高尚与卑劣变得不再重要,道德的约束力由此被削弱。

不过,理解这种心理根源,并不意味着为“P图”行为开脱。在公务员选拔上,越是竞争激烈,越需要守住道德的底线。

“德才兼备,以德为先”,是公务员选用的一条基本准则。在依法全面考核“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”的基础上,“德”是放在首要位置的。曾任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的杨士秋在接受采访时就曾指出,“无数事实证明,公务员出问题往往不是出在能力上,而是出在道德上。”

从这个意义上说,品德过硬,才能赢得群众信任。“P图”改分数,虽然与考公固、作弊的恶劣程度不能相比,但其行为逻辑本质上也是一种欺骗。

该考生不只把虚假分数发在社交平台,还主动通过私信联系同岗位竞争者。这样自以为是的“小聪明”,实则是一种“真愚蠢”。真相被揭穿后,其政审环节必然面临压力,而他所报考的法官助理岗位,恰恰让公众对其道德品行有更高期待。这并非围观群众“上纲上线”,而是一种完全符合公务员选拔逻辑的道德筛选。

不过,批判个体之外,也应正视信息公开层面的一些漏洞。考公“心理战”并不罕见。在一些公务员考试领域的热门工具中,“晒分查排名”“估分排名”等功能被广泛使用。虽然平台设有审核、考号核验等筛选机制,但仍有人虚构或伪造分数给其他考生制造焦虑,这类行为被称为“搞心态”。无论是从精力还是从金钱的角度考量,一旦考生以预估分数为依据,侧面判断出自己没有“上岸”希望,就会倾向于放弃岗位。

“搞心态”之所以能奏效,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。有的地方在公布面试成绩时,会将笔试成绩和分数详细公开;但也有些地方,直到公布体检入围名单时才一并公布笔试、面试及合成成绩。这之中存在的信息差,就容易被一些有心人利用。

对“P图”事件的讨论,与其在道德层面争论不休,不如从制度层面呼吁改进。在保护隐私和保证公平的基础上,确保及时、透明地公开具体岗位的笔试成绩和排名,供考生作出备考决策,这或许是最直接的解决方案。

“儿童友好”建设藏在街头巷尾的细节里

□ 余明辉

3月17日,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联合印发《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,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对儿童友好建设作出系统部署。

这份涵盖空间改造、公共服务、权益保障的系统性部署,彰显了“儿童优先”的发展理念,为亿万少年儿童筑牢成长屏障。唯有将《意见》落地落实,才能让“1米高度”的视角真正融入城市肌理,让“儿童友好”从口号变为现实。

落地落实,首在守住法治底线,让政策有刚性支撑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四条明确规定,保护未成年人应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,给予其特殊、优先保护。此次《意见》的部署,正是对这一法律原则的细化落地。现实中,部分地区出现“儿童友好设施建成即闲置”的尴尬:公园的儿童游乐区被围栏围住,理由是怕担安全责任;社区的母婴室沦为杂物间,难以发挥实际作用。这些问题的根源,在于责任未压实、机制不健全。推动儿童友好落地,必须将法律要求与政策部署绑定,明确各部门、各主体的职责,细化安全保障边界,让建设者敢投入、管理者敢开放、使用者能受益,杜绝“建而不用、建而不管”的形式主义。

落地落实,要聚焦关键领域,以小切口破解大难题。改造中,深圳建成百余处儿童友好公园,让孩子实现与自然零距离接触;交通保障上,苏州定制通学公交,郑州设置“爱心斑马线”,让儿童出行更安全;公共服务里,东莞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,推广“无哭声手术室”,读懂孩子的情绪需求。这些实践告诉我们,儿童友好的落地藏在街头巷尾的细节里,一个适配儿童的标识、一处安全的游乐空间、一次优先的出行服务,都能让政策温度直达人心。

落地落实,更要凝聚全社会合力,让“儿童友好”成为共识。儿童友好建设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,而是政府、社会、学校、家庭的共同责任。政府要做好统筹部署,补齐乡村、欠发达地区的短板,通过经验传授、人才帮扶,让儿童友好惠及每一个孩子;企业要主动担当,在商场、景区、交通枢纽完善适儿设施;家长要积极参与,主动发声反映需求;更要倾听儿童的声音,让政策制定“问计于童”,让孩子的意愿被看见、被尊重。

儿童友好建设是一场对社会温度的考验,也是对责任担当的检验。唯有摒弃形式主义、压实主体责任,把每一项部署落到实处,把具体的关怀送到孩子身边,才能让儿童友好在扎实的落地实践中变为现实。



沉下去观察,立起来评说

官方微信: 捞舆工作室

投稿邮箱: dzrbplb2016@163.com

## 漫评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

### “理旧账”是给百姓“做嫁衣”

【事件】

今年全国两会,一名领导干部接受采访时说:“有些旧账梳理出来,是前四五任留下的烂摊子,也得理……理旧账也是政绩。”一席话引发热议。

【点评】

现实中,少数干部存在一种认识误区,认为处理“旧账”是帮别人做嫁衣,或认为“旧账”是前任留下的,与己无关,或认为“陈年旧事”理起来费时费力难出“显绩”,不如“另起炉灶”干些短平快的新项目来得“风光”。这种回避矛盾、割裂历史的态度,实质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,将个人得失、短期效应置于事业发展全局和群众利益之上,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,反而会拖累发展步伐,损耗政府公信。

新官上任,本就肩负着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使命,接过的不仅是岗位与权力,更是发展的接力棒、群众的期盼心。新官“理旧账”,是给百姓“做嫁衣”,是用责任建“新功”。

“理旧账”需要智慧,更需要方法,绝不能异化为“乱翻账”或“一刀切”。要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,深入调查研究,弄清“旧账”产生的背景、缘由与现状,分清是决策失误、客观条件变化还是执行偏差所致,做到心中有数、手中有策。要依法依规,分类施策,在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内积极寻求解决方案,对于合法合规的承诺、协议,要勇于认账、积极清账;对于因客观条件变化确实难以按原计划执行的,也要主动沟通、协商调整,寻求最优解;对于违法违规形成的所谓“账目”,则要坚决纠正,绝不搞无原则地“兜底”。(文/章伟华 图/徐进)



# 中考“瘦身”之后,“破内卷”依然有路要走

□ 崔凯铭

近日,吉林省教育厅对中考事项作出调整,自2027年开始,将生物学、地理学科调整为考查科目,不作为中考计分科目,考试形式为开卷,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。

近年来,已有安徽黄山、江西吉安、陕西咸阳等多地接连宣布生物、地理将不再计入中考总分,一场以科目“瘦身”为表现的中考改革正在全国多地铺开。

减负担、破“内卷”,是近年来教育领域的关键词。“双减”措施全面落地,大幅压减考试次数,减轻过重作业负担……一系列措施陆续出台,旨在给义务教育阶段的激烈竞争降温,把学生从白热化的考试竞赛中解放出来。中考作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出口,承载着选拔功能,此次调整中考科目,直击考核指挥棒这一“内卷”的关键环节。

然而,中考减负措施出台,在舆论场上收获的却并非只有掌声,还有担忧。

担忧的声音,可以归类为几个方向:首先是对科目边缘化的焦虑——中考不计分之后,面对计分学科的教学压力,学校、学生、家

长是否会“战略性”放弃这两门课?由此引起教学衔接上的焦虑——若初中草草学过,到了高中,生物、地理恢复计分科目地位,学生能否跟得上高中的进度和难度?

可以看出,这些声音并非对改革本身的否定,而是对改革落地实效的关切。中考作为重要的选拔性考试,变化率一发动全身,在考试“减负”的同时,做好配套工作,才能让政策出发点的善意被师生和家长接受。

对学科边缘化的担忧,反映出一个深层问题。应试惯性下,一门课的价值往往不是由学科自身,而是由“考不考”决定。这本身就是个需要被反思的问题,说明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还有太多需要调整的空间。

消除焦虑的基础是稳定过渡。吉林省教育厅的通知提出,2026年,现行计分科目不变,降低考试难度,不计分自2027年开始实施。这为师生适应新变化留出了一定的缓冲,而在缓冲时间里,重新考虑生物、地理科目的教学设计尤为关键。

在现行教育体系下,考试是教育的出口,

教学是教育的核心。生物、地理虽不计分,但在高考科目未作相应改变的前提下,初中的学习依然重要,不仅是为高中学习打基础,也关系学生相应学科素养的形成。

随着中考考核变化,如何衔接初中与高中的学科知识体系成了一个挑战。打通初高壁垒,衔接知识体系,需要两个学段共同努力。初中可以调整教学目标,从应试导向转向综合素养、学科兴趣、思维方式的培养;高中需要重新评估教学方式,在应试环境下适应生源基础的变化。考核改革倒逼教学调整,若能在减轻中考负担的同时不影响教学效果,不失为一件多赢的好事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吉林省此番调整,除了考试科目变化,还同步提出了扩大招生规模,取消普招比例,鼓励各地探索招生录取和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的措施。

考试的变动总是牵动家校师生的心,使得这几条措施容易被忽略,但其分量并不亚于前者,反而触及破除教育“内卷”的另一个关键。

长期以来,中考焦虑的一大根源,是高中名额有限和普职分流带来的不确定性。改革措施必须触及这一点,中考的竞争激烈程度才真正有可能降下来。

眼下,随着时代发展,变化或许会成为教育领域未来的常态。变化之所以让人焦虑,不是因为“变”本身,而是因为激烈的教育“内卷”让心弦绷得太紧。

教育“内卷”的风暴中心,看上去是考核选拔的指挥棒,但根源终究是在优质教育资源充足与否上。中考“瘦身”,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考试层面的压力,是必要的减负之举。但若真想真正破除教育“内卷”怪圈,还需要在更根本处下功夫。

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提出,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,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,有序推进中考改革,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,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学位招生试点。相信随着蓝图逐渐落地,教育回归成长本义将不再遥远。

# 放心成为日常,消费才能上扬

□ 李岳岳

## 大众时评

双氧水漂白的鸡爪,狂飙的租赁电动自行车,用玄学话术疯狂敛财的增高机构……今年“3·15”晚会曝光的一系列案例,再次刺痛公众神经。

每年的“3·15”,都是一次集中警示,它不仅照见消费市场的病灶,也照出我们每个人作为消费者的焦虑。从震惊愤怒到追问求解,社会目光最终会凝成一个共同的期待:我们何时才能不再担忧、警惕,迈入一个可以放心消费的新阶段?

当前,新型消费层出不穷,消费环境面临的挑战也愈发复杂。比如家政、托育等服务消费,很多人虽有尝试意愿,但因为对服务质量的担忧,“怕踩坑”成为普遍心态。不确定性催生的不

信任感,导致许多潜在消费需求在观望中消散,创新服务难以真正打开市场。

消费领域的乱象,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的不透明。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,商家掌握着绝对的信息优势,如果隐瞒产品缺陷,夸大宣传功效,消费者便难以辨别真伪;再有网络平台泛滥的水军“控评”、虚假广告等等,不断干扰着消费者的判断,就连所谓的避雷帖,也难辨是真实经验还是隐性营销。这让人们在消费决策时不得不步步谨慎,从而推高了整个社会的选择成本。

如果花钱变成一门需要研究攻略、反复比对,甚至运气加持的“学问”,消费者要练就“火眼金睛”才能避免踩坑,那么消费信心和意愿又如何提升呢?

放心消费,始于值得信赖的市场环境。人们经常用“闭眼入”形容放心可靠的商品,我们

需要的,正是这样一种可以“闭眼入”的环境:消费者无需练就“火眼金睛”辨别真伪,就能买到好的;不必进行反复比对,凭借自身喜好,就能买到对的。好的消费环境就像黏合剂,能使供给与需求更顺畅地对接,更动态地适配。

信任的形成非一日之功,要过的是消费的第一道关就是安全。安全是消费的信心根基,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。比如食品安全,今年是漂白鸡爪,去年是保水虾仁,年年曝光年年有。屡禁不止的背后,折射出生产流程的失范和监管环节的疏漏,也折射出违法成本过低的现状。筑牢这道关,必须让制度“长牙”“带电”,通过更严格的监管和执法,切实提高违法成本,让安全保障扎实落地。

第二道关是品质。消费者之所以信赖大品牌,本质上信赖的是品牌背后的品质。建立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,不仅在于生产出

高品质的商品,也在于打破信息壁垒,让品质“看得见”“可验证”。现实中,推动信息透明的方法有很多,比如小番茄溯源码的推广,让农产品有了“身份证”,产品持证“上岗”,消费者自然多了一份信任。

第三道关是便捷。这关乎的是消费的顺畅度。它既包括基础设施的“硬”联通,如物流网络覆盖率、城乡流通的效率等等;也包括规则与服务上的“软”联通,比如消除不合理的准入限制,简化维权流程,创新消费场景等等。一个便捷、高效的环境,能降低消费过程中的摩擦与成本,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对接,从而释放更多的消费潜力。

商家严于律己,而非“等到3·15再说”;监管时时在线,不因“晚会曝光”才动,如此,消费者才能在任何一天都安心消费。当放心成为日常,消费才能上扬。